



文学的潮汐

九十年代文学的六大模式

● 张 韬 著

文学的潮汐

九十年代文学的六大模式

● 张 韬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文学的潮汐

张 刚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插页 250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5059-2066-9 定价：10.80元

1•1446

序言：

文学评论与读者之间

一九八九年春天，台湾文化界称作“龙旋风”的文学批评家龙应台女士来京，与十几位作家、评论家座谈时说，她的《野火集》印了一百二十版，当时，我又羡慕又惊讶，以至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数字，可是龙女士用肯定地语气告诉我：“是的，是一百二十版。”一本书竟然再版得那么多，拥有那么多的读者，作为一位批评家她也真走运！联想今天大陆的文学出版界，不说不景气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即便是颇为畅销的优秀小说，也不敢幻想那似乎是天文数字的再版次数啊。

就是在这文化危机与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价值跌落的今天，我编选《文学的潮汐》这本书时心中怎能平静呢？我不大记得以前编选自己其它五部文学评论集时的种种心情了，只记得当时很激动，尤其是那还散发油墨香味的第一本书呈现眼前时，曾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不过，《中篇小说论集》出版时那是幻梦实现了的自我激动，编这本《文学的潮汐》时想得更多的是读者。正是为了读者，在我的激动中包含了更多的不安。因为，现在不同于往日，当银根抽紧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为支持你的书出版而作出舍利取“文”

的崇高决策时，当读者在物价暴涨面前将紧绌的买菜钱节省下来买你书的时候，你的心怎能安静下来？于是，我思考了一个问题：文学评论与读者之间究竟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一位很有名气的作家朋友告诉我，他写作是给自己看的。我佩服他的勇气，但又不敢苟同他的见解，哪一个写文章的人不渴望读者的目光呢？“文学是要使人变得更好。”这是现实主义巨匠高尔基的艺术主张。其实，强调表现自我的现代主义作家，同样推崇类似的文学口号。美国现代派文学大师威廉·福克纳写小说时很注重表现自己主观情感和人物的内心世界，但他认为“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他的作品应该支持人，帮助人们巍然挺立并取得胜利”（《获得诺贝尔奖金时的演讲》）。福克纳说的不止是作家，其实也是文学理论批评家的使命。你的理论观念，对作家作品的阐释与升华，你对文学思潮和艺术规律的把握，你的思维方式，赞成什么与反对什么，这一切无非是为了读者“巍然挺立并取得胜利”。

评论为了读者，但为了读者并不是拿自己文章去迎合与取悦读者，更不是媚俗。媚俗取宠将使你对各种泛滥的思潮与流行时尚失去清醒意识与抗争的力量，沾污了评论与读者真诚而神圣的关系，使圣洁跌入庸俗的泥潭。所以，我很欣赏世界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一句话：“作者创造他的读者，正如他创造了他的人物。”

为了读者，创造读者，固然应该了解读者的审美心理、情感与情绪，但评论家与读者真诚、平等的对话，我以为首先要有自省、反思的意识。文学评论者尽管是对别人作品提

出的批评，可首要的是善于评论自己，反省自我，没有彻底地自省意识，就不可能对作家、对他们笔下人物形象有着心灵相通的理解，不大可能发现自己在洞察作品中的世态人情，探求创作中的优劣得失时的弱点，时时注意更新自己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以获得新鲜养料与自我进击的推力。评论者对读者欣赏习惯与审美力负有启迪的责任，但不应高踞于读者之上，惟有一种深刻的自省意识才有可能贴近读者，了解和反映读者爱与憎的情绪，切莫置读者欣赏意识于不顾。沉溺于自我私情的漩涡。自然，尊重读者并非是简单地认同，盲目地适应，而是使读者在对评论文章的接受过程中唤起对艺术的再创造与自我重新塑造的热情。

文学评论是一种局限，在读者面前，评论家要有勇气承认这种局限。评论实践的挫折与痛苦不止一次告诉我，对于一个批评者来说，在脑子仅仅只装有几条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习惯和满足于原有的批评方式，这对于眼花缭乱的各式各样的作品不是万能的，而是有着这样与那样的局限。批评固然需要理论，用文学理论的尺度衡估作品，然而单凭几条原理几句名词术语，绝对写不出好的评论来。说到底，评论是阅读与欣赏作品过程中的感知、顿悟、发现和理性的升华，是个人阅历经验的投影和性格、情致、生命的体验。评论文章的写作不是拿作品跟书面文学理论去对号，而是一篇小说、一首诗使你勃发了灵性与非批评不可的激情。对于任何类别的作家与任何主义、风格、流派的作品，无不抛掷一番洋洋洒洒的评论，对此，我素来抱以怀疑。创作是作家个性的产物，批评是批评家个性的物化。而个性（包括禀赋、素质和学识等），总是制约着批评者特定的审美领域，限制：

着他无法彻悟个人审美特性圈域以外的那些似知非懂的东西。批评家固然应该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视野，但随意染指于他的局限圈和无知的盲区，对于读者这无异于欺骗。

美国学者马克·萨尔滋曼在中国讲学两年回国后写了一部《幽默的中国人》，其中它描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有一次在课堂上他朗诵雪莱·杰克逊的短篇小说《中彩》。小说叙述一个小镇每年举行一次抽奖，居民都需参加，中奖者的奖励是被众人用乱石砸死。许多学生对这个故事困惑不解或感到厌恶。萨尔滋曼对学生作了这样的解释，这篇小说是对某种现象做了夸张，这种现象是世界性的，不仅仅美国才有。生活在松散的社会群体中时，人们会干出个人独处时决不会干的事，包括某些令人发指的事。听讲的学生说，谁会傻到这种程度——抽奖去死？中国人不会相信，你们美国人想象力太发达了。听课学生中唯有一位站起来做了一段与众不同的发言。他说，他看见过类似的事情，“文革”中每个人都想表示对毛主席的热爱，大家都想学习毛主席在长江大河里游泳，于是成千上万人跳入湘江，人挤人，人压人，推推搡搡，连挥手划水的余地都没有。悲剧终于发生了：湘江就象一大锅汤，人们象饺子一样上下漂浮，许多人被众多的人层挡压于江底而淹死了。我所以不厌其烦的、大段大段地引述这个故事，只因为这位美国学者无意中道出了文学评论的一个真谛。如果将听小说的学生都看作批评家，那么，对《中彩》感到迷惑或厌恶的，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好的评论来。唯有经历过湘江悲剧的那位学生，体验到在个人迷信烟雾弥漫下，有人才会干出“个人独处时决不可能干出的、包括某些令人发指的事”，他才对《中彩》具有特殊地领悟，才有

可能写出相当精彩的评论来。反之，对于卡夫卡的《变形记》，那位聪慧的学生也可能变得笨拙，而有的压抑中感受到“变形”之苦的人，也许会闪放出了不起的领悟之光。从这个意义说，评论对于哪怕是学识博大、大名鼎鼎的评论家，也有无法体验和把握的“死角”，有他的局限。只有认识到这一严峻的事实，评论家才会清醒，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任何批评家都不是囊括一切的权威，只是文学神秘世界的一个探索者，只能对他感知到和把握得了的艺术对象作哲学的沉思与美学的审视。有良知的批评家，他必将具有自知之明，敢于否定自己的局限，他绝不会用空泛的理论与虚妄的辞句去掩饰局限，而是努力寻求自己，竭诚发挥个性、情致和文化艺术素质所赋予自己的优势。尤其是当今文坛呈现出色泽纷繁各式各样的作品，再也不能用传统封闭的思维方式以不变应万变了，用一把钥匙去开千把锁是徒劳无益的。批评家与读者之间如果说靠真诚相联系，这真诚则要求对审视对象确有实感，有感而发，一字一句地写出自己的感悟和真知灼见，而不是用令人头晕目眩的新名词掩盖自己失血苍白的面孔。一句话，读者想听的不是众口一曲的合唱，而是独属于批评者自己的声音。

批评也是一种激情。批评作为一门科学当然需要理性和冷静，它与激情似乎悖谬的。然而批评又是艺术，它与创作一样，是一种创造，是个体生命力的搏斗，是对文学作品的再创作。“情者文之经”也，因此它必须不可离开汹涌澎湃的激情。这激情不是浮夸空泛的，而是对艺术女神缪斯的钟情与挚爱，对圣洁文学的百折不回的献身精神，是对读者胆肝相照的赤诚。我认为，文学不论是面对现实还是超现实

的，不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的，伟大作品都是作家的理想选择与激情之火冶炼而成的。人们不是在探求文学创作的“动力源”吗？弗洛依德的“性压抑”说，尼采的“权力意志”说，以及“干预”或“介入”生活说，自我“宣泄”或“解脱”说，姑且不论它的偏与正、片面与全面，但这一切不是都可以称作现实生活中激情的爆发吗？文学的创造，更新，变革，都是一种激情的驱力，评论与读者之间如要建立密切的关系，二者之间的纽带应是由激情编织的，二者融入激情之中才会沟通、理解、共鸣与契合。评论对读者传达什么？社会的、经济的、伦理的、审美的阐释，文识与艺识的渗透，艺术的分析与技巧的点拨，这一切尽管是评论不可或缺的，但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一个必须传给读者的东西，这就是激情，用激情燃起读者对艺术作品欣赏时的再度创作之火。一些评论家爱说：“我所评论的就是我”，其实，评论的个性不是自我表白或发泄，不是随意性地离开对作品的准确把握，只有在独有的激情及其激情独特表达方式中，才会闪耀出个性之光。当你的激情消解时，你也就将失去与读者沟通的渠道，那就是你的评论生命枯萎与结束之日了。

“文学评论与读者之间”的话到此应该结束了。现在，将《文学的潮汐》的编选想法，简单交待几语。我在拙作《小说世界探索录》一书自序的结尾，引用了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中”。我所取的不是它的本意而是另一层意思，借它以鞭策我不要重复自己。可是究竟如何，还要请读者与文学界朋友来评判。这本集子可分这样几组文章，近年发表的世纪转型期，“过渡”期的文学研究文章放在前面。《世纪转型期文学的六大模式》发表于《中国文学》

今年第一期，《寻找中的过渡性现象》刊于九二年第二期《文学评论》，二者在《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还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文学》英文版译介国外。收在第二组的《小说新思维》、《文学的新思维与新格局》、《报告文学的轰动与小说的沉寂》等文在报刊上陆续发表时，曾被认为是我思维空间拓展与价值观念变化的产儿。一位青年评论家在《小说评论家张韧印象》一文中说：“他以现代意识寻觅小说的蜕变和新潮的轨迹，去烛照、去洞察创作中的问题”。其实，这是过誉，它不过是我探求文学的新思维与新价值取向的初步尝试。书中第三组文章是我应一家文学月刊之邀，在“现代意识与文学”总题目下所写的系列，企望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观念撞击中，从理论观念与创作实践的结合中，寻求现代意识与文学的关系。当时我只打算写二、三篇就算了，出乎意料的是，文章系列刊出后颇受读者的注意与欢迎，在责任编辑一再敦促之下，只好严守每月一篇的刊物规定，一年凑齐了十二篇。至于第四组关于文学批评的文章，如《当代文学评论与未来学》写于八五年新观念新方法大潮的初期，当时在《批评家》杂志头条刊出时颇引人注意，但今天的评论文章已远远超出了“未来学”所提的模式方法，而使它应该归入“历史”的陈迹。《批评的尴尬》在《文艺报》发表时主要针对一九八七年前后的流弊，但时至今日，文章所谈的文学评论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尴尬”了。《谈谈小说评论》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出版“六年制重点中学高中语文写作”课本中收入我的《小宿舍与大时代》（评《女大学生宿舍》）一文的同时，嘱我写了这篇评论“入门”的文章，现将它跟《批评的尴尬》等编在一起。

目的想透视近几年文学评论蜕变的轨迹，也算是笔者处在蜕变期中文学批评观的一角吧。

去吧！让《文学的潮汐》带着我的良好祝愿和读者见面吧。我对世纪转型期的文学与文学思维学的浩瀚世界的研究，这仅仅是开始。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日夜写于京寓



· 作者自语 ·

张韧是我的笔名，原名张家钧。建国初期在渤海之滨盖州古城读中学时参了军，枪法平平，笔却写出不少小诗与小说。1959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梦想当大作家，64年毕业却分配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小说世界探索录》等评论集与《中外中篇小说名作选》等选本共出版了14本书，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大辞典》也即将问世。几次获奖，几个文学团体理

ABE70/06 02

事与编委。由研究实习员而研究员，名曰评论家，但时而还是写一点小说与散文。

世理知之不多却懂得，文学是认识世界的，但写作者首先要认识自我；文学介入生活，但做人要超脱生活；跋涉于学术道路上要发挥你的优势，但成功却取决于发现自我局限与突破局限。

目 录

序言：

文学评论与读者之间	(1)
世纪转型期文学的六大模式	(1)
寻找中的过渡性现象	(15)
文学新思维与新格局	(44)
是长篇的旋风 还是三分天下	(52)
报告文学的轰动与小说的沉寂	(60)
小说新思维	(69)
创作主体个性化与多样化选择的时代	(84)
生存本相的勘探与失落	(94)
1988 年中短篇小说：潜流着的三个思潮	(104)
1991 年小说四大现象	(107)
审美、历史感与哲学意识的凝聚	(127)
张贤亮小说的新探索	(134)
挚爱与抗争的轨迹	(139)
为苏眉一辩	(160)
叙述方式、家庭结构与生活的网	(170)
小宿舍与大时代	(182)

真实·真情与审美的融合.....	(189)
——柯兴《石评梅传》序	
她带来了别一世界.....	(199)
——张聂耳《上流风情》序	
郭沫若历史剧的时代精神.....	(209)
“现代意识与文学”十二谈:.....	(229)
一、现代意识与文学的关系.....	(229)
二、主体意识的张扬.....	(239)
三、流贯文学十年的反思意识.....	(247)
四、潜流的忧患与涅槃的互补意识.....	(254)
五、纪实：小说审美的新潮.....	(261)
六、现代城市意识的失落与寻求.....	(271)
七、时代的变革与道德的困惑.....	(281)
八、文化的层次、属性与现代文化意识.....	(290)
九、变革意识：时代文学的精灵.....	(302)
十、急遽嬗变的价值意识.....	(310)
十一、现代小说文体意识的复苏.....	(319)
十二、这是寻找与确立自己哲学意识的时代.....	(331)
当代文学评论的未来学.....	(344)
批评的尴尬.....	(359)
谈谈写小说评论.....	(366)

世纪转型期文学的六大模式

人，屡屡象那“站在十字路口的海格拉斯”（普罗迪卡斯语）。尤其在历史新旧交替的转型期，谁不面临这样的困惑与求索：人是什么？人应怎样活法？文学是什么？建立什么样的人生信念与文学的价值取向？旧的否定了，新的价值理想体系又是什么？这一连串问号是无法回避的。当今世界存在各种各样的危机，从战争、核武器、人口爆炸、环境污染到资源匮乏与人类生存危机，但最为深刻的还是价值观念的危机。难怪美国著名学者菲力普·劳顿说：“价值问题是当代哲学家们关注的中心。”其实，它何尝不是文学家们关注与探求的中心命题呢？

价值观念的困惑，反映在今日社会文化心态方面嬗变之急剧，真叫人瞠目结舌、惊讶不已。曾几何时，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中新观念新方法轰然而起，举凡带有“新”字的东西是被不加思索的狂热接纳；今天评价九十年代文学的时候，“后”字又被推崇备至、优礼有加。诸如后新时期、后现代、后解构、后乌托邦、后文化、后殖民、后人道等七“后”，联袂而至，排山倒海。于是，有些文章称其为“后批评者们”，或简称“后们”，有的甚至责怪它们“哗众取宠”。我却觉得，对那些想法不应嘲弄与指责，尽管它们的阐述与论证存有不少缺陷，但作为一种新概括、新提法，无疑活跃

了文学界的思想。不必讳言，今日中国之文学现象，确乎与西方后现代某些特点颇为相似。然而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概念不是始于今天，三、四十年前早已有之，而在我们中国文学中为什么到九十年代这一理论方才凸现？况且，连西方现代主义研究专家、荷兰学者汉斯·伯顿斯也承认，后现代主义的定义应当每隔五年调整一次。也就是说，它在西方是一个不断调整的概念，我们又何必过多套用呢？因此，我以为探讨世纪交替的九十年代的文学，出发点与立足点必须面对今天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境况，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大背景中探求文学的价值取向及艺术思维模式的新现象。

我所以把九十年代称为转型期，因为它不仅仅是时间概念，更为强调时代转型的意义，即今日中国不但正在结束几千年的封建小农经济形态，还告别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开始转型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般来说，偶像使人的价值信念中心化、封闭化与单一化。小农经济与中央计划经济无时不在制造价值偶像的崇拜，当市场经济打碎它之后，价值取向必然出现多种多样的新特点：其一，由计划经济大一统的单一中心论，转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多元多样、不确定性的价值观。多元形态的市场经济催发了亿万大军竞相前行，激活了个体与个性、自信与创造力，但市场经济又召唤了个人物欲的膨胀，轻贱精神价值而向物质金钱与唯我主义倾斜。社会经济转型使阵容统一的新时期文学终结，出现了多元多样的、充满竞争与各写各的文学新格局。然而，转型期价值观念的迷乱与光怪陆离的诱惑，使文学失落了传统的理想精神，浮躁、迷惘，唯我中心与无所适从，也给文学蒙上一层缺乏深度与力度的阴影。其二，曾经作为社会主